

当代中国的 若干 经济政策 及其理论

谢百三



当代中国的若干 经济政策及其理论

谢 百 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的若干经济政策及其理论

谢 百 三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

开本: 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9.375

1989年9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2次印刷

字数: 228 000 册数: 3 001—6 000

•

ISBN7-300-00735-X

F·199 定价: 3.60元

目 录

第一章 我国近年来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	1
第一节 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初级阶段理论	1
第二节 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	16
第二章 价值规律、价格政策及价格改革	25
第一节 价值规律和平均利润	25
第二节 决定价格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	27
第三节 我国价格体系的不合理状况及其原因和后果	28
第四节 价格改革初期的物价上涨及价格改革的基本原则	35
第五节 近年来我国进行的价格调整及价格改革	40
第六节 我国的物价改革为什么不能快速到位	46
第三章 按劳分配与工资、奖金问题	57
第一节 按劳分配	57
第二节 社会主义的工资与工资改革	61
第三节 奖金以及与工资奖金有关的问题	73
第四章 社会保险、职工福利（即劳保福利或社会保障） 制度及改革	81
第一节 社会保险及职工福利的内容及性质	81
第二节 现行的社会保险及职工福利制度	87
第三节 “英国病”的根源及其对我国发展保险、福利事业 的警戒和启迪	118

第五章 税收及税制改革	121
第一节 税收的基本概念	121
第二节 税收的必要性	122
第三节 税制构成要素	128
第四节 我国税制的沿革	130
第五节 我国现行主要税种和政策精神	132
第六节 利改税——我国税制改革的重大步骤	137
第六章 我国近年来投资重点、特点及有 关理论问题	162
第一节 投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62
第二节 近年来我国投资重点	165
第三节 关于我国东西部地区投资比例问题	171
第四节 近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特点及其对策	179
第五节 关于“拨改贷”问题	194
第七章 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的政策及实践	198
第一节 城镇住宅商品化的必要性	198
第二节 城镇住宅商品化的改革目标与改革内容	203
第三节 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的重要一步——烟台方案的 出台	204
第四节 理论界关于城镇房屋商品化的其他意见	213
第八章 人口问题及我国的人口政策	218
第一节 世界与中国的人口问题与人口理论	223
第二节 新中国的人口问题、人口理论和人口政策	218
第九章 乡镇企业的发展	237
第一节 发展乡镇企业的意义	237
第二节 乡镇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243

第十章 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坚持、改革与完善·····	254
第一节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	254
第二节 我国目前社会主义公有制内部结构改革、完善的必要性·····	256
第三节 我国的公有制改革及完善的两权分离模式：承包、租赁、资产经营责任制·····	263
第四节 我国的公有制改革及完善的另一种模式——股份制·····	278
后 记·····	289

第一章 我国近年来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一、重新科学阐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必要性

古今中外的历史变革、社会革命无不具有科学的理论作行动指南。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有《商君书》中汇集的精彩理论造舆论；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有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重要著作作指南；中国革命的胜利有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为武器，因而它们成功了。我国的改革要顺利进行，经济要健康发展，也应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南。

我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8年以来的10年，是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和政治建设的最好时期。198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14996亿元，是1978年的3.15倍，平均每年递增11.54%；农业总产值1987年比1978年增长60%以上。其中职工的年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664元上升到1987年的1423元；农民的年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上升到1987年的463元；城乡居民银行存款从1984年的1400亿元增长到1987年末的3075亿元。我国的粮食总产量自1984年首次突破8000亿斤大关以来，持续保持丰收的好势头。1985、1986两年由于自然灾害和结构调整，产量虽有所下降，但粮棉产量仍比1978年分别增长28.5%和63.1%，1987年

粮食产量又达到了8048亿斤。经济改革带来的变化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需求得到了一定的满足。经济改革还同时带动了政治、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卫生战线体制的改革。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与过去比较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扬，总的来说，人民是心情舒畅，畅所欲言的。学术界、文艺界、思想理论界百家争鸣，尤其是经济学研究有了较大的突破。

但是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改革却遇到了巨大的困难，除了众所周知的物价改革中的物价体系复旧问题及新旧两种经济体制接轨时的种种矛盾、漏洞外，令人更为不安的是伴随着收益攀比、对物价上涨不满而重新浮起的改革10年来一直存在着的观念和认识的模糊，相当多的人在50年代末期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二、三十年的贫困，低工资、低收入，排队或凭票争购日用消费品，工作靠混“大锅饭”，在政治上搞“一言堂”，不敢讲真话，时时得表明自己“三忠于”、“四无限”的“左”的异常时期，毫不怀疑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完全性与纯洁性，不失民族自豪感；而对于今天的快速发展的经济，对于今天人们可以公开批评党内外不正之风及讨论党和政府的政策的局面反而怀疑我们所从事的伟大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反而忧心忡忡或困惑不解地担心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否有偏差，反而发出了诸如“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变到解放前”，“特区对外开放是引进外国资本家的剥削”，“破产，失业，涨价和资本主义有什么两样”等种种奇怪议论。这种奇怪的思想与认识上的“逻辑”与混乱形成了远比“物价复旧”、“双轨制交替”更巨大，更险峻，更难以想象的阻力，这种思想与认识导致了相当一部分人对我国近年来贯彻实施的一切重大经济政策失去理解、信任和支持，在疑惑、偏见甚至对立中，进而形成了对改革与建设的现实的阻力。

这样，重新科学地向人民阐明，论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

全会提出、十二大报告和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重申的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就作为一个紧迫、现实的任务放在经济理论界的研究工作者面前。因为它在人民心中承认、理解和接受的程度实际上已经关系到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与成败。

二、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依据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类历史的发展先后依次经历过或将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其初级阶段为社会主义社会）。近年来，不少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还可具体分为下述几个阶段：

1. 资本主义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含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奴隶社会等〕。

共产主义社会	{	2. 过渡时期。
		3.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中等发达阶段，社会主义发达阶段。
		4. 共产主义社会。

关于人类发展历史阶段是否可以逾越，在国际国内都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原来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爆发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因此，经济处于相对落后的俄国，曾有人认为当时不该发生革命。列宁多次向党内外驳斥这种观点，他认为，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来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样，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那么布尔什维克完全可以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

另外，苏联对于自己处于什么历史阶段，有过多次争论，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认为，苏维埃国家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

主义过渡时期。他还指出，社会主义是个很长的、复杂的时期，要经过许多阶段。

1936年，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布苏联已基本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939年，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苏联进入了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逐步过渡的时期。

1953年，赫鲁晓夫提出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时期。

1976年，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上正式肯定了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

安德罗波夫提出苏联正处在发达社会主义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

1986年10月，戈尔巴乔夫在全苏高等学院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的讲话中又谈到苏联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

这种争论同样发生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陈独秀，就一直坚持认为，中国必须先搞资产阶级革命，以俟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了，资本主义在中国高度发展了，再发动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的这种观点，必然导致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抬头，导致大革命的失败。毛泽东等同志同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后来中国共产党内大多数人都认识到，资本主义发达阶段是可以逾越的；而且从十月革命胜利起至今的历史证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确实同样可以在那些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获得成功，资本主义发达阶段不是不可以逾越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任何历史阶段均是可以逾越的，毛泽东同志发现，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极其落后的大国，必须经历一场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他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而所谓民主主义，……

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他指出：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毛泽东同志特别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不同于旧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也不同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是只适合于一切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他特别指出，这“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①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也是不可逾越的，这是与当时党内一些坚持“左”的错误的领导的主张，即直接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观点大相径庭的，曾经一度被错误地斥为农民意识的主张。但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是对的。正是有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才团结了千千万万的人民大众，获得了1949年的胜利。

在全国解放前夕通过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曾指出：在我国“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并指出将要有一个“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1952年，我党还准备以10—15年左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即准备有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有一个允许资产阶级存在的类似于新民主主义的时期。由于正视现实，方针正确，从1949—1957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相当快恢复发展。到1956年，我国就较快地通过公私合营，赎买等方法，迅速完成了农业、手工业（个体商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公有制为主体的全国经济格局确立了。

过渡时期结束后，我国究竟进入了一个什么性质的历史阶段，这在当时也是有争议的，或者说不清楚的。实际上当时已

① 《毛泽东选集》，1964年版，第626、636页。

进入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说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进入是进入了，但是尚未完成，不要说已经完成。他还认为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是当务之急。因此，1956年党的八大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这种状况之间的矛盾”。八大指出的这一主要矛盾，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

但是时间仅过了一年，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11月提出：中国要用15年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95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讲话中，又提出要争取在7年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这样，在全国就掀起了一个在短期内“赶英超美”的热潮。而实际上，这是一种逾越历史阶段的“左”倾思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继而发生的事是毛泽东同志根据斯大林认为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的思想，出现了让集体所有制尽快地向大集体甚至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思想，即将初级社、高级社迅速合并成人民公社（一个人民公社约要合并31.3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且当时还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而人民公社又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1958年9月下旬，全国出现了有94个县成立了全县一个人民公社大社的事实上的全民所有制情况。

随之而来的事情就是取消自留地，甚至规定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私人的少量家畜、家禽也将逐步转化为公有。1958年4月2日，中共中央还发出了要加强对残余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贩进行严厉的限制和改造的措施的指示。1955—1959年我国有10万多个手工业合作社分别转为人民公社社

办厂（占35.3%），联社经营的合作厂（占13.6%），甚至转为国营工厂（占37.8%）。实际上，这都是逾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左”的思想、主张，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直至1958年12月10日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才发觉了其中的错误，做出了纠偏的决定）这种无视我国的实际国情，无视我国正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倾向，后来日趋严重，毛泽东同志还一再地将我国的主要矛盾，改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生死存亡的斗争，改为“阶级斗争为纲”，并出现了诸如1957年夏天反右斗争扩大化，1959年反“右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等一些错误的政治运动。使中国的经济发展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干扰和波折。是否可以这样说，20多年中我们所犯的“左”的错误，我们国家所走过的弯路，都是和不了解我国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有关。

现在，当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遇到了重大困难，我们又一次思考人们的奇怪观念、逻辑时，从重重困惑的迷雾中，人们突然发现了那个时隐时现的重大问题仍然横在中国发展的道路上：历史阶段问题，我们全党全国人民又面临着1926—1927年，1940—1941年，1955—1956年，1958年多次出现过的我国正处在什么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能否逾越，是否应该逾越的老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改革自觉性就难以提高。

那么为什么说，我国至今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呢？为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象新民主主义历史时期那样是不可逾越的呢？

首先，我国是处于社会主义阶段。

我国现在处于共产主义的初期——社会主义阶段，这可以从我国早已在1949年就打倒了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反动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并早在1956年就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要分配原则的个人消费品分配形式，

这可以从政治、经济两方面加以论证。这一点在全国人民当中是没有什么疑义的。

其次，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且这个历史阶段是不可逾越的。这可以从生产关系，生产力两个方面加以论证。

第一，从生产关系角度论证。如果说，在其他问题上应以生产力为主要标准，但在历史阶段分期上，则应该同时把生产关系标准放在一起考虑。从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看，虽然早在1956年，我们就完成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以国营企业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形式，和以农村合作社为代表的集体制形式的公有制占了主导地位，但是公有制内涵和外延都存在着严重的不完善、不成熟之处。其表现是：

1. 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的建立，从总体上消灭了阶级剥削的基础，但生产资料并未实现马克思原来设想过的生产资料的全国性集中的情况。从十月革命胜利后至今的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事实上都只能将生产资料分散给千百万个企业去个别使用。这样，现实的经济模式使经济学家发生了左右为难的情况，如果不承认企业本身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是法人，不承认企业本身的工资总额及企业生产、福利留利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就会大大降低每个企业的生产资料的使用效益，如同1979年以前30年我国国营企业的“利润全额上交”情况那样，就会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的理论。相反，如果无条件承认企业的独立经济实体地位，无条件同意企业的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挂钩，又会被迫承认一些非劳动差别——如企业之间不同的技术构成，有机构成；不同的市场条件，不同的地理位置；不同的原材料价格等引起的“收益”差距，这又和马克思主义的等量劳动换取等量报酬的思想相悖。尽管现在承认了前者，并通过调节税等方式加以平衡，但每一个平衡政策都又挫伤了另一些真正通过劳动提高效益的经济组织的积极性，每一个平

衡行动都顾及左邻右舍。

2.社会主义国家的国营工矿企业与集体农庄（人民公社）的公有制组织结构，原来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的一旦劳动人民共同掌握了生产资料，劳动人民就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劳动积极性就会象火山一样迸发出来的设想上的；但是现实生活告诉人们，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必须靠一定的经济制度和规章使个人的物质利益获得与他的劳动量挂钩来调动和保持。而我们的公有制内部的结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脱钩的，许多国营企业、人民公社的劳动组织形式是责任、权力、利益三者脱钩的结构，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大锅饭”结构。这是一种极不成熟，极不完善的公有制内部结构。

此外，在相当长时间里，占公有制成分80%以上的国营企业是纯粹的国家投资，在企业中的劳动者个人投资更成为忌讳。人民公社的情况类似，除少量乡镇企业有个人投资外，以集体投资为主要投资来源。

这种纯而又纯的投资方式，是发生“责、权、利”分离的重要原因，导致了企业（集体）劳动者积极性不高，对企业（集体）发展麻木不仁的状况。

3.由于我国的总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生产力又呈多层次，应该有一些与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中小型非公有制成分经济组织，如小型私营工商业企业，农民联户办工商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让它们与公有制经济长期共存，互相促进，互相竞争，促进经济的发展。遗憾的是1956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开始，在生产力多层次，总的生产力水平很低状况未变的情况下，我们由于急于求成，急于求纯，过早地将82%的私营工商业改造为公私合营，将92%的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导致了公有制经济的大一统格局，违反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延缓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进程。

顺便指出：不应该把“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视为是一种落后的经济模式，一种权益之计，一种无可奈何的政策，而应将它视作刺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加快公有制完善，改革的科学的合理的方针。尽管对私有制企业应加强指导管理，但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并不是贬义的，这就如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英国作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亦有封建经济和公有制经济，这并未影响马克思将英国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并藉以透视，写出《资本论》；这就如同中国12—19世纪有典型的作为主体的封建经济成分，亦有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但这丝毫没有改变毛泽东视中国为封建主义经济，并加以研究。《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100多年中，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有了高度发展，任何社会制度的国家都没有避免生产力的不平衡性与多层次性，几乎都出现了生产大型化和小型化、集中化和分散化并存的格局；出现了与此相适应的多种经济并存，相互竞争，相互淘汰的局面。可见，“多种经济并存”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仅有的，而是许多社会共有的。这种格局不姓“社”也不姓“资”。在现阶段，它显然能大大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因此，“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也将是我国的一项长期政策，甚至在将来的社会主义中等发达阶段，也会有这种格局存在的可能性。

4. 从生产关系的另一个方面考察，即生产关系的实现过程——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来看，我国至今未能较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按劳分配”原则，这是因为，在社会化程度很低，市场体系很不成熟的背景下，我们的公有制不仅在生产资料的个别使用（即分散到不同企业）中，甚至在生产资料与个别劳动（即同生产者）的结合方式上，无法为全社会的每个劳动者自由地、机会平等地提供劳动条件。社会所承受的只能是权利和机会不完全平等条件下的劳动差别。即，尽管马克思认为按劳分

配，还是一种商品交换，一种“资产阶级权利”，但即使这样，我们都还不能实现。对于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职工与大西北、大西南的企业职工，对农民与工人，我们的各人消费品的实际分配都较高、较低地偏离“按劳分配”的中线较远。

另一方面，在同一个企业和同一个地区中间，我们又受自然经济下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观念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供给制影响甚深，干好干坏一个样，多劳少得或少劳多得的现象十分普遍。1958年，平均主义的典型是过早地将“按需分配”引入现实生活，大刮“共产风”，1958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在《奔向共产主义的乐园》一文中说，河北省徐水县有31.2万人（全县31.8万人口）吃食堂，实行敞开吃饭，“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时期，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的最高仙境”，该县办了几百个食堂，“按劳分配”原则受到了严重破坏。

“文化大革命”中，又将“按劳分配”的原则攻击为“利润挂帅”，甚至按劳分配贬为资产阶级的不光彩的原则。将加工资，评奖金，都搞成平均主义的按人头分配。

平均主义的影响，至今还很严重，这表现在人们对于承包、租赁成功者的个人收入的不满，及获奖人心有余悸，不敢拿应得奖金这点上。

5.再从生产关系的另一个方面，即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考察，我们的公有制模式并没有出现革命成功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期望的，在新社会中领导与劳动者之间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都在科学的领导、指挥下，和谐地忘我劳动的局面。事实上我们的企业领导者要受到来自上上下下的种种束缚，缺少指挥生产的应有的自主权；各级经济领导者在宏观决策与指挥中，自觉地运用经济规律的能力，制定计划，宏观指挥的能力还有待于提高；我们的个别劳动者——工人、下层职员也相当多数地处于被动的、消极的等待指挥、领导和按部就班的工作之